如果笔者的判断没有错误的话，本书是王汎森仅有的三本专著（而非论文的集合）的第二本。写就本书时，作者尚未就学于余英时。我们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处理汉代史料的能力，以及完成一本前后连贯的长篇专著的实力。写就本书时作者才三十岁左右，本书既有出色的问题意识，又没有光提问不作答的缺憾，从某种方面来看，倒未必比作者后来之文字要逊色，甚至有过之。

本书题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而非“古史辨运动的来龙去脉”，则作者自然是将论述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古史辨为何诞生又为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上来。引论“激烈反传统与黄金古代的破灭”一章是对古史辨发生的时代，即二十世纪初的中华民国的一个背景的交代。作者不仅借此说明了“古史辨”所主张的对古代信史的怀疑，其实前人早有发覆，而且进一步指出，非得到了民国初年这样反传统气氛弥漫整个社会的时候，对古史的怀疑才能成为一波及广大、影响剧烈以至于前无古人的境地，激起滔天的巨浪。

第一章“顾颉刚层累造成说的特质与来源”，旨在从一个较为整体的角度，分析古史辨运动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层累造成说”的特质与来源。需要承认的是，在未深入了解之前，通过零星的信息，包括从字面理解与余英时在《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中的介绍，笔者以为“层累造成说”的核心，主要停留在对史料分析中“层层积累”、“多次转译”的警惕。这一层的涵义，当然已经是现代史学所公认的基本预设之一，顾颉刚能在二十世纪早期便独具慧眼而提出此论，确为中国史学上的一大进步。但实际上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尚不止此一层，顾氏还有一层重要的判断或者说是假设，即认为层累而成的古史是有意伪造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对顾颉刚“层累造成说”观点的形成，在反传统的时代潮流之外，作者还举了崔述的《考信录》、胡适提倡的科学方法、孟姜女研究的启示以及清季今文家的历史解释作为重要的推动因素。本书之重点，不在全面分析古史辨运动产生的所有因素，而是在于关注“层累造成说”为何会具有“双层”的意义，作者将原因放在了清季今文家的历史解释这一因素上。

本书第二第三章都是对“清季今文家的历史解释”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第二章讨论的是清季今文学家在返求孔子原典的目标下，逐步发展出全盘否定古文经的地位，宣称所有古文经都迷失了孔子的本意。第三章则进一步讨论，清季今文学家追寻孔子“真正”的理想蓝图的另一项结果，几乎不受限制的发挥“微言大义”的方法来解释群经，进而将所有的今文经解释为孔子手造的，故其中的史事也全属虚假。

第四章“顾颉刚与古史辨运动之兴起”，总算是正式切入了古史辨运动的内里。作者在此章中，首先讲述了顾颉刚对康有为吊诡式的继承：否定所有上古信史；将两千年来的儒学视为“伪学”，使人觉得孔子思想与中国历史完全无关（按：作者此处理解或表述应有误，至多能说是孔子与其生活时代及之前的历史完全无关）；将整个儒学传统孤立在孔子一个点上。由于作者对清季今文学家思想和顾颉刚受康有为影响极为详尽、可靠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顾颉刚实际上没有对今文学家的基本思想做出太大的变动，或者说，仅仅是调整了一点，从“尊孔”变为“反孔”，如是而已。类似的历史吊诡性甚至可以发生在同一学派的身上，笔者试举古希腊犬儒学派之例，早期的犬儒学者大概倾向一种愤世嫉俗之世界观，但之后的犬儒主义则发展出了丧失道德原则、玩世不恭，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变成照单全收，不知羞耻。作者接着讨论了古史辨运动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几个论题，包括：禹的问题，经书的历史性与伦理性冲突，五德终始说，先秦诸子的历史背景，以及层累造成说的变形——神话分化说。

本书之主要成就，在于作者对古史辨运动之思想渊源，特别是清季今文学家的解释与顾颉刚对此的继承，做了一详尽的梳理。作者不难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古史辨运动的主导思想，特别是“层累造成说”，今日来看实在是得失参半，在对康有为、廖平思想的“修正性”继承上，大有顾颉刚“所宗非人”之感。我们也可以由此而推想，正是古史辨运动主导者所固有的偏激性，使得古史辨会迅速进入沉寂（历史确实如此，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又重新进入了发掘信史的阶段）。顾颉刚及其古史辨运动固然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但“时势”或许比“英雄”更为重要，“现代的”怀疑精神借此而“完全”在中国史学界扎下了根，但其本身未能产出太多有意义的成果（作者之比喻殊为恰当，“在倒洗澡盆时也把婴儿倒掉了”），而且说到底，古史辨运动的怀疑精神与所谓“科学方法”也不是在中国思想界前无古人的。

但本书亦有相当遗憾之处。其一，作者虽谈“清季今文学之历史解释”，但始终没有廓清何谓“今古文学之争”，又何谓“今文经”、“古文经”。历史书写中概念的不清，自是对读者的莫大困惑，尤其是作者常常直引今文学家之观点而缺乏评点，更易令读者茫然。此下笔者以钱宾四《两汉今古文平议》为基础，简要梳理一下所谓“今古文之争”。大概来说，两汉实际并无所谓“今文经”、“古文经”之争，亦无“今文”、“古文”之别，只有“今学”与“古学”之辨，完全与后来清人所谓门户不相干，更无刘歆伪造经书之事。如此，如以汉儒视角，实难以分辨何谓“今文经”，何又谓“古文经”。“今古文”争论，完全出于清末学者之捏造与误解，而与汉代学术之真相无关。故谈“今古文之争”，实际完全是清末思想史之事。至于清代学者为何有此一曲解，则需待有专书论及，要求此书作者不仅具备清代学术史的充分知识，且需有贯通汉代学术的视野，笔者现尚未见有相应分量的论著。

其二，作者虽在前言中，希望本书能够探讨古史辨运动之影响。但作者对此的工作，显然缺乏了一层，即对在古史辨运动指导下的工作成果，特别是第四章中所提到的几个论题的结论的评价。后人怎样理解古史辨运动，也包括对古史辨观点的修正、批评，这一部分上作者的工作还不算完善。

最后，作者为本书所安排的结构，写作的重点似有轻重不当的嫌疑，主要是二、三章太多了些，合成一章的篇幅更为合适。而一、四章又太少了，适当扩写、丰富，当更好。不然，本书主要的研究性、开创性的工作，便主要留给了对清末今文学家历史解释的阐释上，反倒是对古史辨运动本身解释还显不够。